

大地之上,凡草木植物皆有根,有根方活,根壮方茂,根深方固。

植物莫不向上生长,朝着天空和太阳的方向伸展,并且各呈其姿,以绿色为主色调,开出的花朵绚丽多彩,构成气象万千的大自然景观。而植物的根恰恰相反,它隐藏在地表下,努力向下生长,将肢体向黑暗处延伸。把一颗种子埋进土里,倘若不小心弄反了,根部朝上,放心好了,它会拐个弯儿依旧向下扎去。向下生长,就是根的方向。

根隐于地下,平时看不到,招致忽略遗忘也是常情。然而根是草木的一部分,有时会以“出土”的方式袒露真容,显示它的存在,并和日常生活发生种种紧密关联。看不见的根和看见的根,其实它都在那里。我最初对根的认识源自去地里拔草,拔草的难易取决于草根。有些草如狗尾草、马齿苋等,根短且浅,一薅即出,丝丝缕缕一丢丢。有些草如牛筋草、蒺藜等,茎叶紧紧贴伏地面,根长且深,抓地极牢,费大劲儿拔,忽地一下带出一块泥土,地上凹一个小坑。故而,用镰刀割草比手拔省劲儿,但欲“斩草除根”就难了,留着根儿就是留着草的命,故大地之上总是芳草萋萋。毫不起眼的草根,其坚韧顽强真叫人不敢小觑。

不只是草,田里的庄稼如高粱、玉米、棉花、小麦、大豆,以及菜畦里的茄子、西红柿等,根都很坚挺。尤其是棉花最难拔,秋后的土地少雨干燥,棉花的根深扎于地下,与板结的土地紧紧地抱成一团,要将其连根拔出,一条壮汉都极难做到,因此拔棉花农有一个专门的工具叫夹子,夹住根部利用杠杆原理将其撬出。麦子、高粱、玉米等收割之后,地里留下的根叫茬子,这些茬子看似是田野里的废弃物,其实是比秸秆更禁烧的柴火。小时候经常干的活儿就是拿着镢头吭吭吭刨茬子。在缺煤少炭的年代,这些庄稼的根充当了燃料。煮豆哪里只是燃豆萁,连根一块烧啊。

某一日趁着天气晴好,我和妻开车去西山闲逛。在道旁停好车,信步沿着蜿蜒小路朝里走去。尽管时令已是初冬,田里种的几畦胡萝卜、白萝卜,缨子仍是绿莹莹的。有几棵白萝卜从土里凸出小半截白胖的身子,胡萝卜也闪出一抹红肩。有意思的是,这能吃的萝卜本身就是根,是一种变态的根,叫做肉质直根,肥厚多汁,营养丰富,与一般的根不同。俗语“拔出萝卜带出泥”,其实萝卜是直根,根须单纯直溜,带出的泥土能有多少呢?蔓菁与萝卜类似,只不过

根的生长

刘江滨



它属于肉质块根,圆形的可爱。红薯、土豆的根都是典型的块根,由侧根与不定根的局部膨大而形成,一棵植株可以长出多个块根。相较而言,萝卜是单根独生,红薯则是多仔,寻着秧子一锹挖去,浑身泥土的红薯嘭嘭跳出好几个,这也并非全部,有的躲在深处不肯示人。

小时候最喜欢的植物是洋姜,既可食又可观赏。它的学名叫菊芋,种在院子角落,一人来高,绿蓬蓬一片,黄色小花与菊花相似,给小院平添了一份妩媚。洋姜的根属于宿根,生命力强韧,枯枝叶萎后,根还活着,而且地下活动能力超强,四处乱串。因此,种洋姜最省事,一次种植后就不用管了,每年这块地都会自动噌噌蹿出洋姜苗,只待秋后收获就是了。菊花、芍药、秋海棠、君子兰等植物的根都是宿根。苏轼诗云:“新蕖蔚已满,宿根寒不凋。”(《甘菊》)赵蕃诗云:“落叶多新积,苍苔半宿根。”(《病中即事》)佛道也常以“宿根”喻前世的根基。所谓天资聪颖,大抵也是说有宿根吧。

对于树木而言,见到树根的机会甚少,除了植树时可以看到树苗的毛毛根,再就是刨树的时候了。早年间奶奶去世的时候,家里没钱买棺材,就把场院里的一棵榆树锯掉了,榆木木质坚硬,也算是上好的板材。这棵榆树也有些年头了,高大粗壮,锯掉后留下了一个硕大的树根,由于碍事,过了一段时间就刨了。刨树根比锯树干费事得多,沿着根部往下挖,竟然挖了偌大的一个坑,树根在地下盘根错节,有粗有细,纠缠纷杂,织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而且你都无法知道根的终端在哪里,到底有多长。伐掉一棵树容易,倘若想彻底“根除”它的根,不啻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刨出来的榆树根人称“榆木疙瘩”,坚贞顽韧无比,被人扣了一顶“顽固愚笨”的帽子。在地表很少能看到树根,那年在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却令我大开眼界,我在那里一睹从未见过的奇异景象:许多树根隆出地面,仿佛条条大蟒弓着脊背,又像苍老的手臂青筋暴露;而寄生植物、藤本植物所生的气根在空中悬吊,向下寻找土地,扎入地下,密密麻麻的,让人难以分清根和茎。因为温度高,雨量充沛,根系太强大了,才有了热带雨林的莽莽苍苍,密不通风。

根是草木植物的生命之源,无本之木,必死无疑,此谓之本根。明人叶子奇《草木子》云:“枝叶之枯,必在根本。”鲁迅《野草》谓:“根本不深,花叶不美。”“本”字是指事字,木下那一横,指土地,穿越土地之下即谓本,也就是根。俗话说“树大根深”,树大者根必深,反之根深则树必大。据说,一棵大树的根在地下蔓延的宽度是树冠的几倍。道理很简单,根是植物的营养器官,负责输送水分和养分,根系越发达,植物得到的养料越充足,就越茁壮。根还负责支撑,向下扎得越深,地面上的植物就越牢固。李耳在《道德经》中云:“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韩非子·解老)解释道:“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为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意思是根使树木获得生命(建生),而蔓延繁密的根系使树木得以维持生命(持生)。成语“根深蒂固”即由此而来。二位大哲借树根喻道,阐明俭嗇修身是治国的根本,如此才能长久永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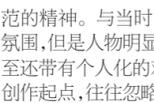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这首大家熟悉的诗是郑板桥对竹子的咏叹,其实更是对根的赞美。在山崖上我们也时常看到有孤松长在岩石间,几无泥土,稍有缝隙根便深扎其间,生命的坚韧令人惊叹。通常,我们欣赏一棵树,吟咏一朵花,是其所呈现出的绰约风姿和馥郁芬芳,令人赏心悦目。而它的根由于隐身地下而常被无视,而且即使出真身也是土头土脑,色彩暗淡,形貌丑陋,厚的是见不得天日。然而,根就像一个母亲,无意荣宠,不惧黑暗,一门心思向下生长,朝深处远处拓展,默默地输送、供养,换取植物向上部分的更高、更壮、更牢。向下与向上看似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却是那样浑然一体、和谐统一。根有多重要看看这些词汇就知道:“根本”“命根”“根源”“根据”“根基”“根脉”……假如一棵树一味向上发展,不屑向下扎根,也可能风光一时,最终的结局一定是被风吹倒或枯萎死掉。

向下生长,终是为了向上的枝繁叶茂。

题图摄影:高浣心



沽上丛话



在工业与「津味」之间选择

艾翔

说起“津味小说”这一创作现象或作家群体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几个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但这个名单里大概不会有蒋子龙。其实蒋子龙在最初的创作里多少呈现出“津味”元素,带有一定地域特色,虽然他更多的代表作承接的是更为阔大的文脉,传承了社会主义文学脉络中那些积极勇敢探索的文学典范的精神。与当时的模式化写作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是紧张的氛围,但是人物明显有“世俗感的松弛”,人物对话更为自然,有地方风味,甚至还带有个人的戏谑。过去的文学研究挖掘蒋子龙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创作起点,往往忽略了他行文风格上的新质和变化。

无论是《机电局长的一天》还是《乔厂长上任记》,都明显能感觉到作家憋着一股劲,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当然这不再是模式化的小说创作带来的。但即使是这样的乔厂长,身边也有说话不清楚的石敢和温柔的童贞,可见作家有意要告别过去那种充满紧张压迫感的小说氛围。到了《乔厂长后传》,被称为“鬼怪式”的杜兵内心记恨乔光朴,用涂鸦针对立公开化,乔光朴则很大度地让他去了更符合自己的岗位,巧妙化解了过去小说中的戾气。尤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语调轻松自如,人物活灵活现,其中“土玩闹”这个词令其几乎成了天下霸唱新作《大要儿》的“前史”。可以说,蒋子龙小说除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还有明确的文化意义有待开掘,关键在于对他早期作品“津味”元素的发现。

不过后来蒋子龙并没有在“津味”层面用力,还有些作品通过修改和重写,也去除了这一微弱的特色。对这种变化,最直观的是两个原因,首先是显在层面,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想写“中国的”而非一地一域的作品,希望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摹写更普遍的经验,描绘更典型的人物,当然就需要淡化作品里的特殊性。其次是隐性层面,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最初几部小说引发的轰动里都包含了十分复杂的生活时份,其中的压力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当然,如果从艺术层面来说,蒋子龙最初所名世的工业题材小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历史背景,本身就带有跨越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的特性,其大开大合的叙事风格也很难完全同地方文化实现融合。加上他对典型人物塑造的执着,素材来源都是天津海北,甚至出现了多地都在争抢“乔厂长”名号的趣事。这种情况下,作品也很难专门表现某一区域。

从作家的自身经历来说,出生于河北沧州,中学时来到天津,经历了一个并不顺利的融入过程。同学年幼不懂事,外来的蒋子龙被嘲笑过衣着尤其是口音,也因此发生过肢体冲突,故而对城市并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后来学技术、参军,又回到了原工厂,都是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同城市建立了深厚情感都是后来的事。因此从作家角度说,当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用这座城市特有的表达进行书写的动力。《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多少带有一些蒋子龙本人的影子,从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自信和独立来看,虽然征用了一些“津味”元素,但只是为了让作品更流畅,是手段而非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蒋子龙的全部作品都鲜明体现出作家作为一个“开拓者”的意图,有时还颇为激进和先锋。因为他期待看到一个新未来,所以对过去某些制度层面的规则和个体层面的行为习惯,都有认为不足取的地方。他寻求的是变革,是新鲜事物、新力量、新风尚和新环境,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新人,因此他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不断行进的感觉,小说里的人物也是不停地奔波“在路上”。由此“改革先锋”的称号固然是一种政治荣誉,但也不妨做一种文学化的解读。这种写作姿态决定了他很难在某些具体的地方驻足,很难在某些特定的书写方式中流连。另外,他作品里经常出现对保守势力、旧人旧制鲜明的批判性,也很难使用到带有深切地方眷恋感的书写方式。

在各种文学思想异常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蒋子龙与“津味”文学擦肩而过。一方面发现自己志不在此也并不擅长,另一方面也处于强烈的创作自觉,主动与其他作家作出区分,既保证了自己的独特性,也作为一种参照系更加凸显出“津味”文学鲜明的地域色彩与艺术价值。从更宽广的文学史展开观察,无论是解放区文学,还是新中国文学,直至新时期文学,特别是现在身临其中的新时代文学,文学的丰富性一直是显著标志。无论是从宏观层面把握并诠释历史的重大走向,或是从微观层面体察人情人性的真善美,都彰显着我们独特社会形态的自信,体现了我们一以贯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

其说实话回来,即使没有选择“津味”文学的路,谁又能说蒋子龙不能代表天津呢?作为一座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天津从来不是单向的。天津有市井、民俗和历史的一面,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一面。只有工业的天津是片面的,只有“津味”的天津也是单调的。正是有了这些自觉创新的优秀作家,一个立体的天津、立体的地域历史及文化得以树立。因为天津的特殊性,天津得以区别于别处;因为天津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天津是中国的天津。因此可以说,从天津,包括天津文学,也能看到丰富、精彩、热烈的中国。

地的爱国斗争,觉悟社成员还联合商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后遭到军警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恩来等进步学生继续研读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不过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开始意识到这些改良和研究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多大的改变,反而是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击退了西方的军事干涉,建立了新的苏维埃政权。那么中国能否以俄为师?“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为了寻找心中的答案,周恩来等人出狱后,在李大钊的邀集下,11名觉悟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与各进步团体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三个月后,为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等人远渡重洋,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途。在法国,周恩来不仅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时制宜”,找到了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旧制度的政治革命道路,而且还影响了留津的进步学生,使他们相信“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应始终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天津到法国,一部分觉悟社的成员在实际的运动中不断验证和寻找中国的出路,他们不断“觉悟”自己的思想。这些觉悟的思想又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影响了国内革命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经验。

第五一〇九期

20世纪初叶,一个名叫弗朗索瓦·内恩斯的比利时工程师,受比利时铁路总局委派,前往中国北方城市天津,协助建造一座发电厂和有轨电车交通网。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轨电车。内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斯普鲁伊特医生兄弟在日期间,给后人留下了海量的原始文件、私人日记及珍贵历史照片,呈现出世纪之交的“中央王国”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时代风貌、生活方式和風土人情,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遗憾的是,在其后很长一段日子里,这些珍贵资料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一本书的编著者意外发现这批资料,才使中比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这段佳话浮出水面。这本书就是《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约翰·麦特勒、马修·托尔克、查尔斯·拉格朗日等著,刘悦、张畅、牌梦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价值,首先是可以丰富人们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尤其是西方工业文明引进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比利时虽是欧洲小国,但上个世纪初,它在钢铁和机械制造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近代中国营造了多项工程,

包括本书中所涉及的京汉铁路和天津有轨电车的建设。以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往往聚焦于英、美、法、俄等大国,而此书从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欧洲小国比利时入手,披露出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这对填补相关研究中的空白点和薄弱处,推动中比关系在新时代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该书编著者在《前言》中所说:“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内恩斯和斯普鲁伊特兄弟早已不在,他们当年生活过的国家已经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不平等条约和租界被抛在我们身后一去不返。中国与比利时是欧盟框架下平等的合作伙伴,在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内恩斯的日记及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时代的变迁,也为中比两国在共同应对未来挑战时,增添了求同存异的思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的出版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文献,并附有生动丰富的照片和绘图,对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特别是上世纪初叶,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工业和交通设施、国际交往、邮政系统、山川风物,以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进行了细腻入微的描述,使人犹如穿越时空,看到了旧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人们为改变现状、争取幸福生活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比利时人通过在中国大地的旅行,被古老东方文明的魅力所吸引,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到丝绸之路,从龙门石窟的精美佛像到宋代皇陵中的石雕、瓷器等,他们将发现或收藏推介到比利时,这对加强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和认同,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纵观中外交流的历史,人们会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最初都是通过传教士和外交官之手,他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以殖民者的视角和心态观察中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他们笔下的中国多是愚昧落后甚至不堪入目的。而《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的原始资料,出自几位工程师和医生之手,其讲述内容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诚如斯普鲁伊特医生所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并不完美,但这一点被他们身上值得称赞的品质所弥补。总的来说,无论贫富,他们都彬彬有礼,性情温和,并强烈依附于他们的集体。”

《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是怎样被介绍到中国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该书译者之一刘悦,现任天津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英语翻译和近代天津历史文化研究。2006年,他结识了比利时工程师,也是本书作者之一查尔斯·拉格朗日先生,两人在交往中发现彼此都有一个爱好:发掘外侨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历史。拉格朗日先生多次来津,听刘悦讲述海河两岸小洋楼背后的故事,对此对这个“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产生了浓厚兴趣。2017年4月至6月,中比两国分别在布鲁塞尔和天津举办“中国与比利时120年共享的历史”文化交流展。在布鲁塞尔展览开幕式上,约翰·麦特勒博士将他发现的上世纪初内恩斯修建天津电车的日记和相册原件向公众展示,这给在场的刘悦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无疑为研究天津城市史打开了又一扇史料宝库的大门。借着展览成功东风,约翰·麦特勒等六位学者合作编著了这本《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并于2020年在欧洲出版。这样,由刘悦将本书翻译到中国,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遇到一些难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外观念上的差异,原文中尚有一些从殖民者角度对中国人傲慢与偏见的,以及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为此,译者在保留原书内容“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在每章之后的译者注释中,加以说明和纠正。相信这本既有文献性又有可读性、趣味性的书,能让读者经历一场有益的时空之旅。

一场有益的时空之旅

《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读后

杜仲华



莲香期颐·叶嘉莹(油画) 孟丽

(孟丽,毕业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专职画家。)

莲香期颐

孟丽

应邀为叶嘉莹先生画像时,她挑了一件不常穿的荷粉色外套,与先生平时素雅的装扮有些不同。这倒激发了我的灵感:先生素爱荷花,是著名的“风雅先生”,其古典诗词造诣更堪以“当代巅峰”相喻,如果选择一个形象,象征她的人品高洁、智慧通达,非荷莫属。

于是,借由先生的荷粉色外套,我选择以荷叶绿做背景色,整体色彩俨然一株荷花,借助巧妙构思,让先生的形象与荷融为一体,温柔中显高洁。

叶嘉莹先生百岁生日诞辰将至,特绘此像以贺。

1919年9月21日下午,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刚刚成立的天津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邀请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社座谈。据亲历者回忆,其间李大钊高度赞扬了觉悟社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行为,讲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他们打开了寻找中国出路的一扇窗。这段历史早已铭刻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也早已广为人所熟知。然而当人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现场时就会发现,这些浑身散发着“革新”“革心”觉悟精神的津门热血青年,他们的思想已经开始冲破狭小的空间,在经历了多种选择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成为

“觉悟”的力量

王静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通过“觉悟”,马克思主义在京津两地点燃了传播的火炬。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形势依旧不平静。一方面旧的体制、观念、信仰和道德随着皇权的崩塌而遭到动摇或毁灭,而强大的保守势力却试图扼杀尊孔读经的浪潮,开历史倒车回到“前清”时代;另一方面军阀割据,“民国”名存实亡,列强侵略与日俱深,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却屡遭失败,一部分进步人士因此而消沉。万马齐喑的年代,陈独秀呼吁以科学和民主代替迷信与专制,试图引入西方文化推动民众“最后觉悟之觉悟”,最终达到改造文化、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目的。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的无能,以及西方国家的“强盗世界”逻辑激发了国内救亡图存的反帝政治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失望,昔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一切问题都可以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且苏俄正在将其变为现实。于是他们很快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批判旧政权为主旨

的政治运动合流。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正式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中国知识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出狱后南下上海,谱写了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的一段佳话。

通过“觉悟”,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津城播下种子。当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少年中国》《新青年》等刊物不断扩大其影响时,留日回津的周恩来正投身于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并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身份“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便是其中之一。9月觉悟社成立后,社员们便邀请李大钊到津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有限的时间里,李大钊无法详细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青年学生,不过他指导学生要注意对“主义”的研究,也要关注《新青年》杂志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这些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一经学习与讨论后,觉悟社成员们便被吸引并取意“列宁第二”,以“列宁二”的名义撰写传单以表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敬仰之情。不过沉浸于新思想中的社员们,尚不知道一年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通过李大钊等人推动的勤工俭学运动赴法留学,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颤动萌发。浸淫于各种理论学说中,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促使年轻的社员们立即要求实践,设计、组织和建立理想社会。一如“觉悟”宣言所说的,“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连续不断地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这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当时黑暗落后的中国现实社会,也不同于当时虽先进却弊病百端的西方资本社会,而是建立一个人人“觉悟”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幸福的理想世界。在当时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现状之下,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激励着青年学生以“真正牺牲”“个人布道”的精神去促社会觉悟和进行社会改造。从8月到12月,除了组织请愿活动声援全国各